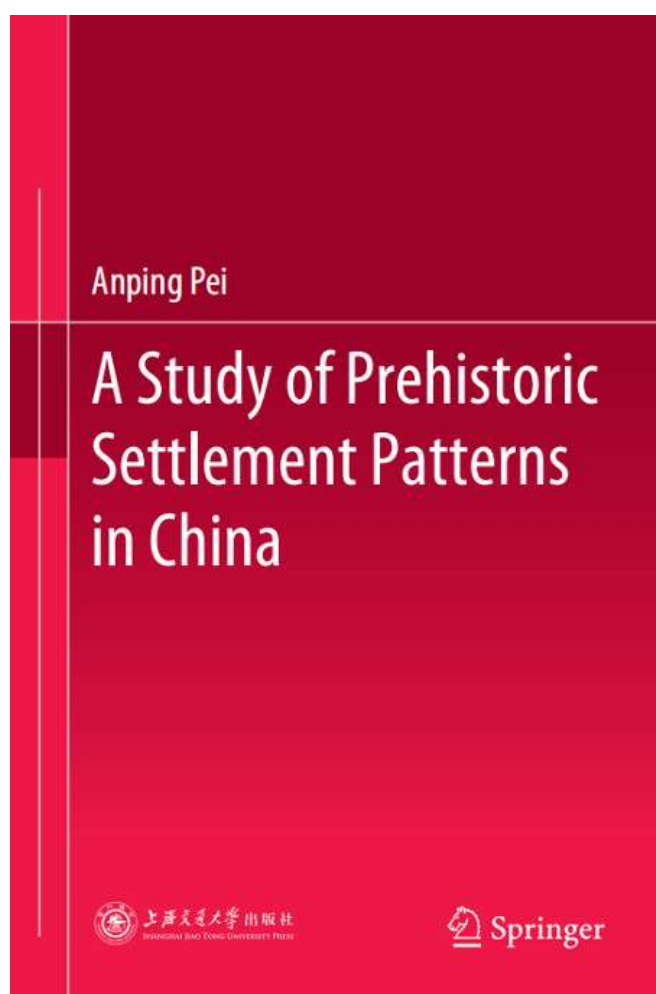




不图浮云，开拓前路

——裴安平老师《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英文版发行访谈



《A Study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China》封面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裴安平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史前聚落形态研究，在国内外创新性地提出了“聚落群聚形态”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继2014年中华书局汉语版的《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一书出版后，今年外译英文版《A

Study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China》也已经由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联合在海外出版发行了。

本次访谈特请裴老师披露了中英文著作编写出版背后的有关故事，以及“聚落群聚形态”的理论和当下国内外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意义。此外，恰逢毕业季，我校文博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毕业生即将走入社会或进入更广阔的学术舞台，为此我们亦聆听了裴老师予后辈们的一些祝福与告诫。

问：裴老师您好，感谢您能够接受本次访谈！我们知道《A Study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China》是裴老师《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一书的英文版，请问是什么契机促成了裴老师这部英文专著的面世，其中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大量西方考古学理论被引入中国，而裴老师作为敢于“走出去”的考古学家，对于这本即将要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带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中国考古学著作，有哪些期待？

答：这本书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课题正式产生于2010年，当时我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项目，这个项目就是书的名字《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这个项目是2013年结项的。大约是当年七月份，国家社科基金办的结项通知来了，泼了我一头雾水，告诉我“不合格”。根据专家的意见，社科基金办还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并告知改好了来年重新申报结项。对这样的结果，我完全懵了。然而，就在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修改的时候，过了国庆节不久，我又接到了国家社科办的新通知。通知告诉我，我的专著已经被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前面的通知作废。对此，我非常高兴，大有起死回生苦尽甘来的感觉。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我的研究思想与方法都被专家们认可了，成果不仅得到了确认，而且成果的档次比原先还高了一级。经查，这本书还是当年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唯一一本考古学方面的著作。

对于这个课题，我当时从始至终还有一种期待：希望以人为本以血缘社会、血缘组织为史前社会研究平台与单位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界引起大家的反思。然而，2014年这本书正式出版以后，学界没有任何反应，完全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想来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假如我的著作在国外产生了大的影响，那么国内学术界不就会重视吗？就这样，2016年我便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由于这本书已是国家社科最高等级的成果文库项目，所以外译项目的申报比较顺利。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和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接手了外译工作，按照合同规定的三年时间，今年完成了这本书外译版的正式出版与发行。

不过，希望“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只是我申请外译的第一个目的。如果说这个目的主要是针对国内，那第二个目的就主要是针对国外。英国社科院院士、剑桥大学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第四届文化遗产世界大会主席、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魁北克大学教授露茜·莫里赛特（Lucy Morissette），先后多次到中国来，并在中国浙江考察了良渚文化的城址和遗迹遗物。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谈到了史前原始血缘社会的复原问题，也没有一个人谈到了城内城外聚落与聚落、聚落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这说明国外和欧美对于史前社会的研究没有以人为本据实复原血缘社会的思想与理念。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世界范围内包括欧美的考古学，在史前考古的理论与方法论方面，主要用地缘社会的概念去理解和认识血缘社会。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学术界曾出现过以澳裔英籍戈登·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

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但是，二次大战以后，这类学者至今一个不见。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当时崛起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紧张，于是就要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人类学、考古学就要划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界限。从此，西方人类学、考古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架空或另筑史前社会形态之路。为什么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群聚现象会被西方的学者们认为是一种单纯的“功能分区”？为什么美国人戈登·威利关于秘鲁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的研究，以及此后兴起并流行于西方的“区域聚落形态”都竭力回避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人类早期血缘组织的名称与概念，甚至不惜用现代地缘社会学的思想、概念和名称来研究史前社会，将古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社区”和“社群”等组织形态都套在他们头上？显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研究的合理性，还偷梁换柱以假乱真，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原貌。

实际上，持续了几百万年的血缘社会与当下的地缘社会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要想研究血缘社会，首先就要复原血缘社会；而要复原血缘社会，首先就要用血缘社会的眼光来看待血缘社会。我之所以想要把这本书外译英语并发行到国外去，就是期待用中国的发现与历史事实改变西方学者的思想与理论。

当然，我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假如都能得到国外同行的理解和肯定，那不又可以更好地反作用于“墙内开花墙外香”吗？



裴老师分享藏书《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问：请问裴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史前考古学中的聚落问题，老师今日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形成的？“聚落群聚形态”这一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裴老师的脑海中，这一概念及整个理论的建立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答：对这个问题，我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认知过程。

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偶遇引发了我对聚落关系的关注。

第一个是 1983 年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发掘石板巷子遗址——当时湖北宜都县一个重要的龙山时期聚落遗址,并辅导本科生实习。由于驻地距工地较远,十几公里,同学们上下班都坐车,而我却坚持每天顺着江边来回跑。期间,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江边隔着十几公里或二十几公里,就有一个遗址群,而群与群之间却都是空白地带。这是为什么呢?虽然地貌都一样,都是很好的河边阶地,为什么相互之间会隔着这么远呢?

第二个偶遇是我在湖南工作期间。当时湖南省的文物普查工作做得非常好。大概是 1987 年上半年,有一个从来没有发现过古代遗址的地区即郴州地区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去帮助他们实现零的突破。我去了,也帮助他们找到了第一个遗址。在我要走的那个晚上,普查队的队员们问我:“裴老师,我们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们,你们就以我找到的这个遗址为中心,沿着小盆地河流两岸从头走到尾,如果能找到五个遗址就可以不找了。果然,就在那一个山区十公里的小盆地里面,他们最后就在我找到的遗址边上找到了五个遗址。当他们带着地图来告诉我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并意识到这样小的范围内能发现五个遗址,说明聚落遗址之间肯定存在某种密切联系。

除了上述二次巧遇之外,最让我对聚落相互关系久久不能释怀的就是河南小浪底水库库区考古发掘的规划工作。1990 年,在中科院国家地质所周昆叔先生的率领下,我们把黄河南岸库区范围内的许多遗址都走了一遍。这些遗址有的距离很近,有的又隔得很远。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烦心的问题再次涌上心头。对此,我虽然一直铭记在心,也知道这可能是理解和认识史前社会的关键之处,可是却久久没有找到答案,因而有关发掘规划也没有做好。至今想起来,还深感辜负了俞先生对我的期望。

90 年代以后,湖南的文物普查发现了比以前多得多的遗址,尤其是湘西北澧县与临澧县的澧阳平原,在 6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 300 多处史前遗址,密密麻麻的。为了搞清楚不同时代聚落遗址的相互关系,我特地到湖南省测绘局买了那个平原万分之一和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把那些遗址通通标在地图上。最终,一个初步想法便出来了:一定是有关系的遗址才靠得很近,它们应当属于史前同一个血缘组织。

不过,由于当时我的考古与行政事务很多,没有时间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所以,来到南师大以后,由于有了充足的时间,并最终结合国内外的民族学资料,为以前观察到的现象找到了合理的证明和注释。也正因此,2004 年我才在《考古》上发表了 I 从事考古以来第一篇关于聚落考古的论文《澧阳平原聚落形态的特点与演变》,2010 年才正式申报了《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这样一个国家社科项目。

问: 请问裴老师如何看待“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探讨中国文明形成之类重大问题的积极意义?

答: 我对这项研究意义的评价,概括起来就是两个词——“金钥匙”和“必由之路”。聚落群聚形态表面上是一种考古的遗存现象,但这种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深邃的历史含义,完全是史前人类社会组织与组织形态的物化反映。一些聚落之所以相互之间近距离抱团相聚,原因就因为他们同属一个拥有血缘关系的聚落组织。换言之,只有拥有血缘关系的聚落才会近距离抱团相聚。这种聚落组织,不仅仅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而且还是当时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实体。正因此,血缘社会的聚落群聚形态就应该是我们认识血缘社会的

社会组织与社会形态的基础，也是我们认识当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平台。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之所以都以国家为单位，就因为国家是人类地缘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单位；所以，血缘社会的复原与研究也必须同样以人类的组织为单位为平台。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为史前血缘社会的复原和研究提供了唯一的一把金钥匙，为现代考古复原和研究血缘社会提供了唯一的必由之路。

问：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与中国考古研究实践相结合，中国考古学界如何跳出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考古学理论这个怪圈，裴老师有哪些最新的思考与认识？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复杂，我简单地谈一谈。我写的《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这本书，一方面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早期历史的一些理论认识。比如恩格斯就认为一夫一妻制婚姻普及的原因是因为财富需要正統的血缘来继承；而我则认为当时大部分人都没有财富需要继承，一夫一妻制婚姻之所以普及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早期个体劳动个体经济出现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认为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与出版，不仅年代早（1884年，也就是一百三十六年以前），而且当时无论历史资料还是民族学的资料都很少，尤其是关于中国的考古资料就完全等于零，因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也就不免具有地域性、阶段性的局限。正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修正。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我们今天所有研究的基础与指导思想，之所以要以人为本，以血缘社会的组织为血缘社会问题研究的单位和平台，就都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最重要的研究思想和研究实践。

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尤其是关于早期人类历史特点的具体认识更不应该变成教条。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考古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量的史前和古代遗址被发掘出来；并为人们解放思想，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裴老师与采访人员交流

关于中国私有制起源原因的探讨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大家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以为是手工业与农业分工的结果，都以为手工业的规模化、分工化、专业化就是私有制、商品经济的证据；长江三峡里的大溪文化居民就因为河边遗弃了大量石器残品，而被认为是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并以制作石器为生。至于中国史前手工业有什么特点，手工业与农业是如何分工的，居然至今无人问津。

更有意思的是，在关于仰韶文化早期及裴李岗文化是否已出现了父系社会的争论中，所有研究者都以随葬器物的多寡为根据，有的认为已经出现了贫富差异，有的认为即使有差异也不明显。总之，控辩的双方都在使用同一件“批判的武器”，都在用其之矛攻其之盾，都完全忘却了“武器的批判”。

显然，不能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了，而应该自觉地将还原历史、研究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考古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问：今天参与采访的也有我们文博专业的本科生同学，裴老师能否结合自身求学经历为他们推荐一些学术著作，能够为他们后来的学术方向选择，学术生涯规划给予启迪？

答：我上本科的时候，老师到宿舍来看望同学们，当时同学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老师，我们该怎么学习呀？您给我们推荐一下。”然而，所有的老师都说：“没什么可推荐的，你想怎么学就怎么学。”确实如此，学习是一种自主行为，就像我读这本《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样，当时我才23岁，距上大学还差二年，屋里连电灯都没有，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从郭沫若、范文澜、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没有任何老师给我推荐和要求，关键在于你愿意看什么。所以啊，学习的关键不是要有人带路，而是要有自我追求。就像毛泽东一样，他写给父亲的那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这就是十七岁的毛泽东啊！当时毛泽东的父亲希望他学点能帮家里做些生意的知识和技能，而毛泽东却自己选择了一条路——去城里求学。这就是一种个人的追求！所以，学习这件事真的就是靠自己。

问：恰逢毕业季，请问裴老师对于我们文博专业即将步入社会或走向更宽广学术舞台的学子们有什么话想说？

答：我没有什么更多东西要讲，就用一句老话：希望大家走得更远，飞得更高。每个人都都要有一点自我追求，我也希望这种追求呢，能够更高大上一点，不要只是“毕业啦，找到工作就好了”。

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言谈举止，裴安平教授的率直坦荡都尽显无余，怀抱一颗热爱考古的赤子之心。目前，裴安平教授虽已退休居家，但仍未停止在学术道路上的继续开拓，在此衷心祝愿裴老师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祝裴老师的新作能够在国内外学界取得巨大反响。

采访人员：赵五正 张新泽

执笔：张新泽 赵五